



10月27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做客齐鲁大讲坛。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著名学者葛剑雄接受本报专访谈教育热点问题

英语是否深造?学生作主!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
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博物馆学会
山东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钢 吉祥

“国家要从宏观上控制博士规模,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不要急于求成,要考虑我们的师资水平。”

“应该给基层领导一些自主权,比如校长、院长如果觉得一个学者正在探索重要的问题,可以这几年不要他拿出具体的工作成绩。如果天天盯着论文,那大家出来的都是短平快的东西。”

“很多科学研究从怀疑开始,光墨守成规行吗?要鼓励异想天开,要给年轻人机会。”

“教育平等只是手段,社会平等才是基础。”“减少英语比重、增加高考次数不能解决问题。”27日,著名学者葛剑雄做客齐鲁大讲坛,给广大“坛友们”带来了他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的独到见解,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对话葛剑雄

一味求多 造成博士贬值

齐鲁晚报:最近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公布后,因为我们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突破,引发了不少学者对教育、科研体制的反思。您如何看待?

葛剑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没有必要,发达国家得诺贝尔奖也是不平均的。诺贝尔奖不是哪个大学教育出来的,莫言是哪个学校培养的?所以,“钱学森之问”,主要是问社会,而不是问教育,教育起不了这个作用。

我们看杨振宁、李振道,到美国没几年就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基础都是在中国打的,杨振宁基础在西南联大打的,难道我们现在的大学真的没有达到西南联大的水平吗?比如钱永健,他在美国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学校有特别的能耐。我们的基础教育很好,但一个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社会机制让他发挥出才能。

齐鲁晚报:科技部部长万钢最近批评科研经费造假问题,您认为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管理?

葛剑雄:其实,这个有办法解决,就是让科研经费回归它应有的位置。少数人贪污科研经费,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科研经费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机制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正常待遇,绝不容许拿科研经费提高待遇,比如说现在大学教师的津贴要比工资高,这个钱哪里来?相当一部分钱不是国家出的,而是科研经费。第二,不要拿科研经费或是项目多少作为评估一个单位或是个人的指标,因为有些基础研究不需要很多经费,比如有的项目1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申请10万或是100万?因为申请多,教授可以分成。第三是目标管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申请过程要公开,结果也公开,至于钱怎么花,少去限制。比如很多实验室是需要人工的,我们对人工费的比重限制得很死。

齐鲁晚报:您是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如何看待现在博士的贬值现象?

葛剑雄:现在博士培养是很正规的,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中国,博士的规模应该多大,而不要一味求多。一味求多之后,该硕士做的事情非要用博士,没有必要念博士的专业人才也去念博士。比如很多大学规定,年轻教师提教授都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博士多了,质量低了,各种丑闻也出来了。

原来有一个规定,申请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完整培养过至少一届硕士生,但后来急于求成,在后面加了一条“或者在国内外指导过博士生的工作”,有这句话在里面,标准就很难界定了,有的还没带过硕士生就带博士生了。

齐鲁晚报:最近陆续爆出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的事情,作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您对于治理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我觉得要把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分开。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非法谋取学术成果、学术地位,老师一般地剽窃、抄袭,不要动不动就扣上腐败的帽子,腐败都和权力联系。大多数是学术不端,所以要分开来看,要根据党纪国法处理。对于学术不端,只要不触及犯罪,还是应该用教育的方法,让学术界自己判断,自己解决问题。

此外,制度上要进行改革,比如现在评职称,有的工作不一定非要通过论文来评价,评价机制要改。不能单纯看论文数量。

本报记者 吉祥 李钢

1 关于体制改革 体制不变,教育竞争将延伸到胎教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听起来有点拗口。”27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葛剑雄以幽默的形式开始了他的讲座。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在葛剑雄看来,中国的教育问

题,主要是教育本身,但教育的中国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教育牵扯到的各方面,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还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离不开教育的中国问题,离不开每个人。

葛剑雄一直对我国的教育问题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见解。“如果现有

的体制不改变,可能就不幸被我言中,孩子的教育竞争或许会延伸到胎教,再往后甚至是基因配对。”一开场,葛剑雄就直指我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从十年、二十年前的竞争高考,到近些年,孩子教育的竞争已经逐步延伸到中考、小升初,乃至幼儿园。

2 关于教学压力 我们追求快乐教育美国却在反思

“大家抱怨我们的教育资源不好。”葛剑雄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在两年前的国际基础教育评比中,上海名列世界第一,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实就在我们抱怨我国教育质量不好的时候,美国也在反省自己的教育问题。”

“为什么我们频频追求快乐教育,美国却在反思他们的快乐教育到底是否成功。怎么来看这些现象?”葛剑雄向听众抛出了这样的思

考考疑问。在葛剑雄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给教育的任务太重了。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到2020年,大学毛入学率应是30%,最高不超过35%。”葛剑雄表示,即使是到那时,同龄青年中能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职在内,大概最多35%,仍有65%同龄青年进不了大学。因此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

葛剑雄分析认为,要真正实现

上大学比较容易,改变现在的“教育乱象”,必须提前将60%左右的同龄青年分流。“考大学前,有的已经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通过了技术培训,这样分流后,家长跟本人才不会有太大压力,老师跟校长也不会有太大压力。”

不过,这样的前提是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大家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但是,这恰恰是现在社会的矛盾问题。葛剑雄认为,现在人们都希望于教育改变自身的地位。

3 关于用人标准 招专科生就行,却非要本科

“为什么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越来越低?”葛剑雄说,这是因为国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在拉大,阶层固化,影响到了教育,而不是反过来教育影响社会。在他看来,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可以作为一个推动社会平等的手段,但只是手段而已,它

根本的因素还是社会本身。

而社会上一些不合理规定也加剧了教育的畸形。“明明是专科生就可以操作的工作,干嘛非要招本科生,甚至硕士博士。”在葛剑雄看来,现在在很多所谓低端的技校、专科都没有了,就是因为用人标准的问题。

葛剑雄以亲身经历介绍,我们招新员工,上面规定必须要正规本科,电大这些都不认。“我就很奇怪,既然它已达到本科学历,为何还这么区分?有的岗位根本用不到大学本科,比如说我要招两名修补古籍的,修补古籍为什么要本科?”

4 关于高考改革 增加高考次数会加重考生成本负担

不少人建议改革考试方式,增加考试次数,且教育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尤其是近期有关减少高考英语分数的改革试点,引起关注。

葛剑雄对此持保留意见。“有人说,减少英语分数可以促进公平,尤其是有利于保障农村学生的公平,但是农村也有英语成绩好的。”在葛剑雄看来,英语教学确实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学到同样水平,“有的专业确实不需要英语,应让大家自己决定

是否深造。”而对于有人提出学习美国“高考”,增加次数,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葛剑雄不认同:“多次考成本可是很高的,会增加考生负担。”

“只有社会本身公平了,才可以体现教育公平。”他建议“既然中国已宣布普九了,那应该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比如多少学生配一个老师,要有什么课外条件等。这样,孩子们的起跑线才一样。”

但现实并非如此。“东西部城市

农村之间的差异严重,中央政府要负起责任。”葛剑雄说,比如深圳户籍人口不到200万,外来人口有1000多万。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不在深圳,而要用深圳纳税人的钱来解决这么多外来人员的义务制教育,这个公平吗?

为此,葛剑雄曾建议,实行教育卡解决该问题,即每个适龄儿童发教育卡,凭卡入学,然后政府根据卡的数量拨发经费,但相关部门答复却是“做不到”。